

## 冷战后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继续争论

刘永涛

**【内容提要】**冷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之间的继续争论不但反映出美国人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认识和理解,而且影响着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领域。然而,这场争论存在着局限性、片面性和狭隘性。

**【关键词】**冷战后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自本世纪初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欧美国家产生以来,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学派便交替主导着西方国际政治舞台。它们之间就如何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而在学术上展开的争论,成为推动这门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这门学科最具活力、最精彩之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以及苏联的最后解体,标志着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之间冷战结束,给整个世界格局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加上国际种族冲突的加剧、海湾战争、欧美国家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地位相对下降等等,所有这些给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会。近年来,美国研究者纷纷著书立说,提出新思想、新假说、新方法、新术语,一方面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省和重建,另一方面试图对冷战后日趋复杂多元的国际关系加以描述和解释,然而,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学派在冷战后的继续争论涵盖了相当部分的探讨内容,仍构成当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sup>[1]</sup>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实主义学派长期支配着西方国际政治舞台,成为指导美国政治家、外交官和学者看待和解释世界事务的主要意识形态。尽管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现实主义认为,这只是一种历史的重复,国际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基本的人性没有改变,国家的核心目的没有改变。因此,冷战后美国现实主义从整体上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们重申和强调了下述现实主义基本理论在后

冷战时期的有效性:第一,以地缘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在其之上没有更高的政治权力或政治文化,从而造成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是结构上的无政府状态,同时造成国家之间为谋求权力、财富和威望而展开无休止的相互竞争和冲突;非国家行为体不足以构成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力量;第二,国家之间彼此构成潜在威胁,一个国家永远不能确定另一国家的真实意图,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相互信赖的程度极低,往往相互猜疑和欺骗,甚至毁约,它们阻碍着国家之间在即使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表达合作的意愿,倘若合作也只是暂时的,它随着共同利益的消失而不存在;第三,治国的目的是要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安全,而获得权力和确保国家间实力的适当分配乃是实现这种目的的最重要手段,国际关系中有待处理的核心成份是国家加强自身相对能力问题,它构成国家之间关系的动力,所以,国际政治中的游戏不但是在持久的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而且是围绕着不断谋求权力和安全而展开的;第四,由于国际政治不同于国内政治,自助原则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原则,即国家行为体最终依赖自我力量和资源来保护和增强自身利益,国家行为是根据国家利益而非道德原则来确定。道德原则只会对国家谋求权力带来阻碍或者只能作为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罢了。国家决不可把自我保护的任务托付给国际组织或国际法,因为没有一种国际权威能够保证它们的约束力和强制力。<sup>[2]</sup>

现实主义的上述理论假设基于对人性的悲观看法。现实主义认为,纵观历史,人性是自私的、有罪和贪婪的,在人的恶性方面,对权力的渴望以及

通过权力征服或主宰他人的欲念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为普遍，因此，要消除人性中追求权力的本能是幻想。国际政治是一场人人交恶的战争，冲突是事物的自然状态，并非由于历史环境、不健全的国家体系、不同的政府类型或是国家之间缺乏足够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所造成的结果。于是，每个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增进“国家利益”，即明确表现为获得权力，国家的其它所有目的均处于次要地位。

美国现实主义者还重视从国际体系层面对国家行为进行认识。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讲，国家之间的相互行为构成一种国际体系，这种国际体系反过来制约和限制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因此，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结果给予特别关注。一些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的两极化是维持国际稳定的最理想模式，处于美苏对抗状态的冷战岁月是一个相对“长期和平”的时期，而在冷战后国际体系趋于多极化的格局里，尽管国家之间经济社会交往活动增加，国际机制及组织功能获得加强，但是，国际关系中种族之间暴力冲突、局部战争和不稳定因素相对加剧。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性质使国家有必要获得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威慑潜在敌人的进攻，因此，国家的军事能力而非经济能力对国家安全更具有直接的联系。如果说所有国家都在为谋求权力和安全而绞尽脑汁，那么，在力量、利益和威胁方面造成和维持一种均势的状态可以确保国际政治的稳定，它是通过不断调整国家联盟体系来实现的。国家对外行为受国家利益的驱动，主要是对外界而不是对国内社会政治力量作出的反应；国家的理性对外决策原则是最大可能地获利，最小限度地冒险。<sup>[3]</sup>

## 二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给美国自由主义学派的复兴带来新机会。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或理论假设是：从根本上讲人性是善良的，有缺陷的是社会制度及机构；人并非注定要发生冲突，人的理性可以造成社会秩序的进步；对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际体系结构进行改革是可能的；只要强化国际主义以及机构的哲学伦理基础，敌意和战争如同疾病一样是可以避免的；国际社会存在着普遍的道德原则，国际组织及国际法是维持全球秩序的一种机制。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说自由主义理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有成为现实，那么，它在当今国际生活中得到验证是一种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思想。

冷战后美国自由主义继续从不同角度和侧面阐述国际自由主义思想，强调通过人获得更大的自由

来实现社会的进步，提出国际合作在实现和平、福利和正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科学和知识现代化的过程又是造成合作和人类进步的驱动力，指出国内事务与国际问题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国家内部的变化可能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版图，强调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途径推进和保护国际人权并提倡人道主义援助，认为在缺乏正式的强迫实施机制的情况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仍然在创造和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自由主义尤其强调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的相互依存如何有助于和平与稳定，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强调民主国家是推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力量，不但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而且发现民主国家之间比非民主国家之间更易于建立一种法的关系；第二，强调国际经济相互依存是繁荣与合作的基础，同时也是推进国际和平的重要途径，当国家间相互作用在依赖的数量、速度、范围等方面达到足够的程度时，国际社会就会有系统地打破深层的无政府状态；第三，指出军事技术交流和军事领域的相互依存可以为国家和平与合作方面造成更大的互利，而且，减少军事暴力的威胁有助于国际经济的合作；第四，强调国家行为体之间在文化、观念、知识、教育等方面的相互交流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协调行动，减少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误解；第五，强调社会因素诸如通讯、组织联系、文化同种模式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指出非政府行为体的跨国活动对国际社会的积极作用；第六，强调国际社会分享共同的道德价值、信仰体系、原则及标准，从而造成行为体之间发生共同的利益和行动，指出国际组织、国际机制或国际法在维护国际安全及合作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总之，它们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在国际社会各主要领域的相互依存及互动作用。<sup>[4]</sup>

美国自由主义者还对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广泛问题给予关注。他们认为，国家所面对的重大难题已经扩大，除了战争与和平问题外，现代化、福利、环境、人口等问题成为当今国家行为及动机的重要来源；安全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地缘政治及军事方面，还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等在内的更为广泛的议题；国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合作关系；国际机构的建设可以减少不确定因素；加强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可以减少基于误会和误解而引起的国家之间敌对状态和恐惧；通过贸易活动减少国际关系中残酷特征；知识、技术以及信息的全球化过程会大大鼓励民众用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待未来；广泛的国际关系问题，譬如贸易问题、爱滋病、移民问题和生态威胁，它们不是单边行动可以解决的，乃需要国际社会的多边努力。此外，国际事务议程在扩大，行

为体的范围也在扩大，它们超越着国家边界。民族国家仍然是重要的行为体，但是，国家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在下降，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力量正在上升。

### 三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首先反映在两个学派所偏重的不同术语上。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均势、地缘政治、威慑、结盟；自由主义强调民主、相互依存、一体化、世界新秩序、跨国联系、国际公民社会、教育和文化沟通等。其次，它们所强调的领域及内容也有所不同，现实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起源与和平的条件，自由主义关注由于需要和资源之间的鸿沟而引起的社会、经济、人口和环境等广泛议题。它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1)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性质。现实主义强调当前国际体系在结构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自由主义指出目前是一种全球性社会，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2) 国际关系中行为体问题。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中主要行为体，自由主义承认在民族国家之外还有广泛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如国际间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跨国集团以及次国家行为体，如公民社会和个人力量等。有人甚至提出未来世界冲突不是在民族国家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间发生；3)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核心动力问题。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关系的核心动力是谋求国家利益、安全、生存和权力，自由主义更敏感于贸易、货币、移民、保健、环境等可能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范围的安全问题，认为核心动力是解决人类的需求以及对付由于需求而引起的日益增多的威胁与挑战；4) 国家行为的动机。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是对国际外部环境作出的反应，自由主义指出国内社会政治及文化因素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

尽管近年来两个学派在一些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但对其作用和结果存在分歧。它们都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特征，但是对其含义和后果存在不同理解；它们都承认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但对合作的目的和作用存在不同认识；它们都承认权力的重要性，但现实主义强调政治军事权力及相对权力，自由主义强调经济权力及绝对权力；它们都承认国家安全和福利的重要性，但现实主义强调前者，自由主义重视后者；它们都承认国际组织及国际法的存在，但是对其有效性抱不同看法。总之，如果说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最终关注的核心问题无非是战争与和平问题，那么，它们的长期分歧主要在

于通过何种方式或手段来减少战争和增进和平。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思想东山再起，开始从长期处于防守状态转而对现实主义主导地位发出猛烈挑战。尽管自由主义学派内部存在各种变体，存在不同的强调重点，但是，自由主义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在对国际关系进行描述、解释、预测和规定方面均存在缺陷和不足，指出它既误解了现实，也误解了历史。简而言之，在自由主义看来，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缺陷，不能足以指导未来的国际关系实践，而要由一个更为新颖、更为严谨的自由主义理论来代替它。自由主义者甚至告诫说，如果国家对外政策制订者在复杂的后冷战时期仍然拘泥于现实主义框架，那么，他们的对外政策就不能正确和恰当地针对、反映和处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复杂现实。<sup>[5]</sup>

### 四

就国家对外政策而言，冷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继续争论，对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取向产生着影响。

在美国，人们一致认为华盛顿应该利用它的影响力来使北京与“国际机制接轨”，促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制度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其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在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美国对华政策制订者及研究者们尚未达成共识。目前，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以及知识界等大体存在以下三种取向，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受到当前这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之争的影响。

第一种对华政策取向是所谓温和的“接触”政策，即对中国采取一种不搞强硬对抗的姿态。克林顿政府、国会等中间一些人赞成这种取向。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明显弱点，对于中国的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倘若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态度，恐怕会促成中国社会内部的不稳定，一个分裂和动荡的中国将会给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及商业利益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种对华政策取向，无论它是温和的接触还是密切的接触，明显受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第二种对华政策取向认为美国不要对中国采取和解态度。美国政府内外一些人持这种观点。他们建议美国应该在亚洲保持军事实力，把它作为对正在兴起的中国势力的一种抗衡，而不应该试图劝说中国相信加入国际合作和机制的好处；提倡美国在与中国处理经济、武器扩散及其他事宜的争执中抱强硬态度；鼓励美国在中国周边与传统上的美国盟国和朋友密切协调，以便处理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

“不测行动”。这种对华政策取向明显带有美国现实主义理论色彩。它的政策特点是强调美国行动上的审慎和警惕，注重势力均衡、军事威胁以及联盟组织作用。

第三种对华政策取向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不可能真正有希望与中国确立一种建设性关系。因此，美国的政策应该侧重关注那些能够促使中国内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机制上，同时，保持一种警惕姿态去处理中国在亚洲及世界事务中可能采取的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对外政策行动。这一政策取向显然揉合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成份，既注重促使中国内政发生变化，又强调“警惕”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

注意到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很有可能继续采取一种兼收上述三种政策取向的模式，交替采纳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在某些问题上，譬如对华贸易最惠国地位与人权问题，美国政府认为以“接触战略”最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另一些问题上，譬如知识产权、导弹技术扩散等，美国政府会继续以经济制裁相威胁，迫使中国“遵守”被美国所认可的所谓国际规则。尽管美国方面明白，公开宣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目的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会产生反作用，但是，美国国内许多人认为，美国对华采取更为广泛的“接触”政策将有助于这种变化。

## 五

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学派分别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发展趋势，它们的理论假设、观点和语汇在当今国际生活中仍然得到广泛使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宰并束缚着一些人的思维发展。然而，它们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片面性和狭隘性。本文只就几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些分析和评论。

首先，理论的普遍性问题。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它们只是透过一定的视角来看待和观察整个复杂的冷战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军事及安全事务方面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低估普遍存在着的全球相互联系这一现实在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轻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自由主义在国际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没有能够有效地说明冷战后国际冲突、地区动荡、种族矛盾、恐怖主义等严重问题。在当今美国，尚未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全部的国际生活现象，也不可能

存在这种理论。换言之，当今复杂变化的国际关系不是哪种理论可以完全概括总结的，不同学派侧重的只是国际关系的某个或某些方面。人们需要利用不同的理论，多层次多视角地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难题。

其次，人性善恶问题。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需要对人性善恶问题作重新认识，两个学派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系列分歧主要源于它们对人性的不同看法。现实主义强调人性恶的方面，自由主义强调人性善的方面。然而，实际的国际生活告诉我们，人性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存在不同侧面，如果说人类既有战争的历史也有和平的时期，那么，人性既有善也有恶。需要回答的一个理论问题是，人性何时趋向善何时趋向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告诉我们，每当大的战争结束之后，自由主义思想往往抬头。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国联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联合国组织以及冷战后自由主义思想东山再起；每当战争期间及战争前夕，现实主义思想通常占支配地位，譬如整个冷战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人性在恶劣条件下趋于表现恶的方面，在舒适环境中趋于表现善的方面。

第三，国际体系及行为体问题。美国现实主义需要对国际体系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国际体系理论中值得质疑的一个问题是，两极化国际体系是否就是美国现实主义所认为的维持国际关系稳定的最理想形式。事实上，冷战时期的所谓“长期和平”状态，只能就欧洲而言是如此，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由于两极对抗而造成战争和冲突的历史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美国现实主义没有说明人们如何铸造出一个它所认为理想的国际体系模式。关于行为体问题，本文认为，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国家仍然是重要而关键的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对国家及国际关系影响的程度，要视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文化结构的差异而定。从目前来看，在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中，公民社会及个人力量对国家对外政策影响的程度较高。而在某些其他国家，次国家行为体尚未获得充分发展。

第四，理论与对外政策。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观念。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反映了美国人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理解是与美国哲学、历史和文化传统等人文因素以及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所处地位、实力等物质条件分不开的。因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眼光和重心往往是上述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譬如强权政治理论只是为强权国家所采纳和实施的，推广民主和人权自由成为冷战后美国自由主义两大思想支柱，可以说是冷战时期美国意识形态在冷战后的延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所强

调的国际关系准则和规范,往往是指那些根据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意志所确定和评判的规范。当前这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继续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冷战后美国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处理当今国际关系的取向。从这个层面上讲,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国家对外政策服务的。譬如美国所谓自由及公平贸易主张直接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美国要利用这类“准则”使自己更方便地进入和占领别国的经济市场,即所谓的霸权准则。再譬如冷战后美国亚太政策明显地采纳并揉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容:为了维持在这一地区的支配地位,美国一方面设法阻止其他行为体过于强大,维持这一地区的权力平衡,另一方面对部分亚洲国家实行战略“接触”政策,使它们有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和贸易市场供美国便利地进入,并试图控制亚太地区性组织或机构的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理论的一部分。

面对新世纪的来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明确它研究的发展方向,需要提出有待探讨的新问题并试图确定所需关注的主要国际事务议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冷战后的继续争论中所反映出的局限性、片面性和狭隘性,有待于它们之间的相互补充,有待于它们与其它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相结合,有待于它们与东方人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看法相交流。尽管如此,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将在一定时期里继续主导美国国家对外政策思路及行为,因此,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 注释:

[1]事实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两大“家族”,各自内部均存在不同变体。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作细分,而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加以通称。关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美国作为主流学派这一事实,还可以从美国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些重要学术杂志的取名中窥见一斑,譬如《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安全研究》、《国家利益》、《生存》、《合作与冲突》、《全球政府》等。

[2]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Winter) 1994/5; Frank W. Wayman and Paul F. Diehl

(eds.): *Reconstructing Realpolitik*,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Fareed Zakaria: “Is Realism Finish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30 (Winter), 1992/3.

[3]Robert W. Tucker: “Realism and the New Consensus,” *The National Interest*, 30 (Winter), 1992/3; 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6, no. 1 (autumn) 1996;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summer), 1990; Kenneth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6, no. 1 (autumn) 1996;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fall) 1993.

[4]Robert Cooper: “Is There a New World Order?” in Seizaburo Saio and Trevor Taylor (eds.): *Prospects for World Order*,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3; Frost, Mervyn: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stitutive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ren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Y: St. Martin's Press, 1995.

[5] Martin Griffiths: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Real Re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8 (July); Stanley Kober: “Idealpolitik,” *Foreign Policy*, 79 (Summer); Joseph, S. Nyr Jr.: “The Misleading Metaphor of Decline,” in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eds.): *The Global Agenda*, NY: McGraw-Hill, 1992; Josef Joff: “Entangled Forever,” in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eds.): *The Global Agenda*, NY: McGraw-Hill, 1992; Justin Rosenberg: “What's the Matter with Re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6 (April); Jan Art Scholte: “From Power Politics to Social Change: An Alternative Focu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 (January); John A. Vasquez: *The War Puzz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